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學

郑少东 著

行动的自我与身体 ——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XINGDONG DE ZIWO YU SHENTI:
JIDENGSI SHENGHUO ZHENGZHI YANJIU

作为一种向生活转向的政治哲学，生活政治以自我和身体为基点，借助情感民主的自然力量，通过对话民主的设想预示了社会发展中新政治动力，设计了全球性政治共同体的未来，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建设性的路径。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郑少东 1978年出生，浙江温州人。同济大学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现为中共温州市委党校教师。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简介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JIANJIE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集中推出学术精品、集中展示学术成果的一个窗口。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采取“鼓励申报、专家评审、资助出版、社会馆藏”的形式，每年遴选反映浙江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优秀原创学术成果的书稿，以“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的方式分期分批出版，及时向社会传播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的新思想、新发现、新进展，努力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浙江“文化强省”建设。

组织出版“当代浙江学术文库”是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的重要探索。“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将坚持学术标准，倡导学术规范，展示浙江特色，不断推出浙江学术的最新成果。

出品人：鲍观明

策划编辑：任晓燕

责任编辑：张爱珍 白小平

封面设计：林蒙蒙

责任印制：包建辉

行动的自我与身体

——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XINGDONG DE ZIWO YU SHENTI:
JIDENGSI SHENGHUO ZHENGZHI YANJIU

内 容 简 介

本书旨在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勾勒出生活政治的学理基础，探索、还原和评估其政治思想体系，横向展现生活政治与其他当代政治哲学的交锋论争，纵向把握其前后思想嬗变的缘由，将其内在的思想理路与理论问题勾勒梳理出来。作为一种向生活转向的政治哲学，生活政治以自我和身体为基点，借助情感民主的自然力量，通过对话民主的设想预示了社会发展中新的政治动力，设计了全球性政治共同体的未来，为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提供了建设性的路径。



微阅读 微出版 微社交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官方微信

上架建议 文化·哲学

ISBN 978-7-5178-1646-1



9 787517 816461 >

定价：39.80元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出版（编号：2015CBQ05）

行动的自我与身体

——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郑少东 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行动的自我与身体：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 郑少东著. — 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178-1646-1

I. ①行… II. ①郑… III. ①吉登斯, A. — 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095.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6738 号

行动的自我与身体

——吉登斯“生活政治”研究

郑少东 著

出品人	鲍观明
策划编辑	任晓燕
责任编辑	张爱珍 白小平
责任校对	尤锡麟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zjgsupress@163.com) (网址: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0571-88904980,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22 千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78-1646-1
定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目 录

第一章	吉登斯“生活政治”概述	001
第一节	由晚期现代性而来的生活政治	004
第二节	生活政治的理论定位：一种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哲学？	017
第三节	聚焦生活政治的学理基础	024
第二章	从等级式权力到能动式权力：从解放政治到生活政治	029
第一节	对二元权力观的继承与超越	030
第二节	等级式权力——解放政治运作的主要政治形态	046
第三节	能动式权力——生活政治运作的主要政治形态	053
第三章	行动的自我：政治活动的起点	067
第一节	当代政治哲学中的自我之争	068
第二节	吉登斯：行动的自我	077
第三节	自我作为政治行动者：对生活方式进行决策的政治意蕴	090
第四节	认同与承认：在关系中界定自我	100
第四章	行动的身体：能动性政治的出台	105
第一节	对福柯“身体—政治肉体”的驳斥	106
第二节	作为行动系统的身体	108
第三节	身体之间的政治哲学	119

第五章 从情感民主到对话民主:全球共同体中的民主化策略

.....	130
第一节 情感民主的提出	130
第二节 对话民主机制的构建	140
第三节 对话民主的基石——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对话	149
第四节 永远在途中的“对话”民主	159

第六章 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

第一节 后传统社会伦理——生活政治的政治—伦理之维	165
第二节 生活政治与当代政治哲学的生活转向	171

参考文献

后 记

第一章 吉登斯“生活政治”概述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 英国上议院议员, 欧洲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①之一, 一位有着独特魅力的思想家, 一位划时代的社会理论家、出版界的独行侠和影响越来越大的政治哲学家,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英国和英语系各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社会哲学理论家……这些称谓如实地表明吉登斯的思想体系宏大而复杂。就广度而言, 他的理论涉及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哲学以及心理学等学科门类; 就深度而言, 吉登斯本人深浸于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经典社会思想家传统之中, 融贯当前欧洲大陆社会哲学的各种潮流。吉登斯把自己的思想发展归纳为两个阶段^②: 第一阶段(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80 年代), 作为学者, 在大学里从事学术研究, 致力于从理论上廓清社会理论所面临的危机, 着眼于包含结构化理论与政治学理论在内的理论体系建设, 思考新的理论来阐述社会的变迁, 为社会哲学理论开辟新的路径; 第二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后), 作为一名社会思想家, 不仅针对知识分子群体进行写作, 而且针对政治家和一般社会民众写作, 不仅用理论来分析晚期现代性的特征, 提出了一系列现代性理论和政治理论, 还参与政治实践活动, 力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① 吉登斯与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 man)一起被称为 20 世纪 90 年代欧洲社会理论界的“三驾马车”。

② 学界认为他的思想发展主要经历三个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 年代初解读经典社会思想家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人的作品; 70 年代中期开始到 80 年代研究社会哲学理论的方法论问题, 建构社会学研究的新方法, 提出著名的“结构化理论”; 80 年代中后期到 90 年代早期对现代性进行理论解读, 关注政治问题, 参与现实政治, 提出包括第三条道路、生活政治等一系列政治理论; 目前, 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和欧洲的政治发展。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吉登斯理论体系受到了众多学者的追捧^①,尤其是结构化理论、现代性理论与“第三条道路”思想广为传播,但其政治哲学思想从未引起英语学界及汉语学界的广泛关注^②,对其政治哲学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初步阶段。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吉登斯没有撰写过任何专著来系统地阐释其政治哲学思想,相关内容只是闪烁在其社会学或政治学的文本中,许多关于政治哲学主题的思考隐含于社会学或政治学问题的探讨之中,造成了吉登斯没有涉足政治哲学主题研究的假象;二是与一般政治理论家不同,吉登斯从社会学的角度介入政治问题的探讨,其中后期著作大多以纲要式而非思辨式的写作方式论述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论述方式不是纯粹的概念演绎和论证,似乎缺乏深度和理论上的论证,以致学界对其政治哲学思想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其思想体系中是否存有政治哲学的观点还尚有疑义。有论者无奈地指出,吉登斯在政治哲学的声誉,如果不是几近于无,至少也不如其在社会学界的声誉来得卓著。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讲,吉登斯在政治哲学问题上似乎是一种悖论,即当他以政治哲学的方式思考行动与结构、个人与社会、能动与制约等根本性问题时,这些研究主题落入了社会学领域,因此最多只能被看作是‘社会哲学’而不是‘政治哲学’;而当他以社会学的经验话语思考国家、平等、正义等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时,他的表现方式又太过经验化和政策化,同样不能为政治哲学所接纳。”^③

事实上,吉登斯以哲学的方式考虑政治问题,以学者的身份参与政治实践,从当代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变化中研究政治问题。为谋求一个具有深度多样性的对话社会而身体力行,他的政治哲学内容包括身体政治、生态

① 吉登斯的著作被翻译成30种语言,英语学界专门研究吉登斯理论的已出版专著保守估计也有45本。自1998年王铭铭组织翻译吉登斯著作以来,吉登斯大半的著作被陆陆续续翻译成中文;汉语学界专门研究吉登斯理论的已出版专著保守估计也有16本。2007年12月,吉登斯应邀访问中山大学,参加“吉登斯与现代社会理论”学术研讨会,进一步扩展了他在汉语学界的影响。

②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吉登斯政治哲学的文献以论文、博士论文或一些著作的相关章节为主,还没有专门研究吉登斯政治哲学的个人专著。国内外学术界对吉登斯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主题:“第三条道路”(基本上收纳在论文集《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和《争论中的全球化第三条道路》中,还可参见郭忠华新著《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的结语部分)、权力理论(参见丹尼斯·朗的《权力论》第14页)、平等概念(参见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的《平等》第49页)、生活政治、“现代性政治哲学”(参见高宣扬《当代政治哲学》的第二章第八节)、“全球化理论批判”(参见邹吉忠的《政治哲学导论》第五章)。研究吉登斯政治哲学的博士论文有陈华兴研究员的《人造的自然:A·吉登斯政治哲学探微》。

③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11页。

政治、文化多元主义、欧洲社会模式、“第三条道路”的政治、超越左与右的政治、对话民主、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结构等诸多内容,对民主、自由、平等、政治等概念做了新的阐述。其中,身体政治、生态政治与文化多元主义是生活政治的主要议题,对话民主既是生活政治实现的制度设想,又是生活政治对接全球政治的尝试,“第三条道路”与欧洲社会模式是生活政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政治策略与政策,世界政府与全球治理结构是生活政治的追求目标。所以,生活政治^①可以说是吉登斯政治哲学中的核心内容。

本书将立足于吉登斯思想全貌,试图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对吉登斯生活政治做学理上的研究。一方面,注意吉登斯前后思想的有机联系,把握其中的变化轨迹,将生活政治内在的思想与理论问题勾勒梳理出来,力图展现生活政治在理论上的构建过程;另一方面,本书采取了比较研究的视角,将生活政治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主要流派的语境中进行解读;把吉登斯的自我观同新自由主义的代表罗尔斯、社群主义的代表桑德尔两人的自我观进行比较,把吉登斯的权力观同福柯的权力观进行比较,把吉登斯的身体观同福柯的生命政治、戈夫曼与梅洛-庞蒂的身体观进行比较,同时还把吉登斯的对话民主思想与哈贝马斯的协商民主思想进行比较,以期对生活政治理论有较深刻的理解。

①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吉登斯生活政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观点:第一,把生活政治视为重建现代性的理论构想:[黄平,1996;黄瑞祺,1997;孙志祥,2000;陈鹤鸣,2000;漆思,2002;郭忠华,2006,2010;陈学明、马拥军,2006;Ian Craib,1992;Ian J. Cohen,1989;David Held,1988;Jon Clark, Celia Modgil, Sohan Modgil(ed.), 1990; Philip Cassell, 1993; Lars Bo Karspersen, 1995; Kenneth Tucker, 1998; Mestrovic Stjepan Gabriel, 1998; Pleasants, Nigel, 1999; Kaspersen Lars Bo., 2000; O'Brien, Martin(ed.), 1999, 2001];第二,把生活政治视为“第三条道路”背后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常欣欣, 2001; 张玉福, 2001; Vicenc Navarro, 1999; Christopher Bryant & David Jary, 2001; Steven Loyal, 2003; Anthony Giddens(ed.), 2001; Anthony Giddens(ed.), 2003; Anthony Giddens(ed.), 2006];第三,仅仅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对生活政治的内容、实质、意义加以研究(邹吉忠, 2004; 郑伟, 2004; 陈华兴, 2004; 许丽萍, 2005; 周德清、李光玉, 2004; 黄皖毅, 2005; 胡颖峰, 2009; 高宣扬, 2010)。

已有的研究,对我们研究生活政治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理论参照,但既有讨论仍存在如下三方面的明显不足或缺憾:其一,重吉登斯理论体系的社会学、政治学思想轻政治哲学思想,研究方向不均衡;其二,流于一般的、论纲性的研究,未能对生活政治与吉登斯前期结构化理论及后期政治哲学思想的逻辑关联进行深度学理探究;其三,未能从政治哲学与生活关系的角度把生活政治作为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生活转向的一种路径进行探讨。

第一节 由晚期现代性而来的生活政治^①

既然本书试图为吉登斯生活政治建立一种规范的哲学方面的论证,那么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何谓生活政治。吉登斯对生活政治下了这样的定义:“生活政治指的是激进地卷入到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②,“生活的政治关涉的是来自于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③,“生活政治是一种生活决定的政治”^④,“生活政治是认同的政治、选择的政治”^⑤。日本的高坂健次提出生活政治(life politics)是与阶级政治、地位政治^⑥相对应的政治类型,它不是寻求生活机会增加的政治,而是注重生活方式和生存轨迹的政治;它不效仿地位政治追求富裕的拥有,也不等同于以前追求生活质量的生活政治,还包括自我实现、自我认同等内容,着意追求自我的生存价值等。鲍曼(Zygmunt Bau man)在专著《被围困的社会》的第二部分中直接以生活政治为题,其内容包括人们消费方式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权威的认同,对于生活的感知,对于政治时刻的寻求等。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指出,这些生活政治的概念都与吉登斯的生活政治确实有相通之处,且与鲍曼的后现代政治理念及詹明信的‘认知图式’追求也存在某种契合。^⑦事实果真如此吗?与吉登斯的

① 文中出现的生活政治如没有特别说明,就指吉登斯的“生活政治”。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7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④ Anthony Giddens: *Affluence, Poverty and the Idea of a Post-Scarcity Society*,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95, p. 7.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⑥ 所谓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是一种利益政治,谋求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社会整合,对集体性、组织性利益追求产生的利益对立进行调停,其核心是阶级利益的对立与调整。地位政治(status politics)早先是针对现代美国社会中极右势力的出现提出的分析概念,由于对社会地位的极端注重、对现状的不安而产生需求不满,这种不满心理投射到政治立场上,并由此滋生对立;这种地位政治最重要的关心目标是提高职业地位、学历、收入等。

⑦ [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八章与第九章。

生活政治概念相类似的还有福柯的“微观政治”^①、贝克的“亚政治”^②,这些概念之间的区分都需要我们明确吉登斯“生活政治”的定义。其实,吉登斯对生活政治有明确的定位,即试图应对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③以来实际政治生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所以为了更好地了解生活政治的内涵,我们首先来了解其提出的时代背景——晚期现代性的内涵与特征,阐述晚期现代性所带来的政治后果,最后再来论述生活政治的含义。

吉登斯对现代性做出了深刻的分析^④,把现代性解释为“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历史性影响的行为模式与制度”^⑤。现代性自17世纪建立以来并不是按单一的直线形式发展,而是同时包含着延展中的压缩和重叠,尤其是“二战”后,伴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高风险参量的导入,现代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比如极权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两极分化”,核电站的爆发和生态的恶化,但现代性自身并没有出现质的变化^⑥,而是进入一个快速变化的阶段。因此,他宣称现代性的发展存在着早期和晚期两阶段,并把20世纪中后期的西方现代性称为晚期现代性。现代性进入晚期阶段,“其后果比以往更加激进化和普遍化”^⑦,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就传统的影响而言,这一阶段传统消解得厉害,自然以飞快的速度消失。书写所带来的储存及恢复信息的形式促进了时空伸延程度的扩展,改变了传统的实质内涵,传统开始被视为许多行事方式中的一种“传统”,它“不再是习俗的一种根基,不再因其久远而受人尊崇,而是一种允许人们质询的话语现象”^⑧。因此,吉登斯称晚期现代性为“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 society),虽然不是一个没有传统的社会,但传统已经被“人化”了,已不是

① 福柯的“微观政治”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

② “亚政治”指,以前未卷入实质性的技术化和工业化过程的团体在社会安排中有了越来越多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对社会和政治决策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从而,政治的领域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政府、政党、议会、司法等方面。

③ 晚期现代性也被吉登斯称之为高度现代性(High Modernity)或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

④ 他对现代性的制度之维、现代性的动力之源与现代性的后果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页。

⑥ 吉登斯之所以反对“后现代性”的称呼,就是因为“后现代性”强调自身与现代性是异质的两种社会阶段。

⑦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⑧ [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08页。

原来意义上的传统了,并常有来自抽象系统的信息注入习惯。空间的商品化也建立了一种特征鲜明的“人造环境”,表现为现代社会中的一些新的制度关联方式。这些新形式的制度秩序改变了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的条件,社会生活脱离了固有的规则或实践的控制。随之,社会关系表现为一种所谓“纯粹关系”(pure relationship),一种随时可以中断的社会关系,一种外在标准已被消解的社会关系,“切断了外在的道德标准之后,在危在旦夕的时刻以及在其他重大生活转变的时刻,纯粹关系作为安全感的源泉,变得十分脆弱”^①。这种关系使得传统与惯例被“不确定性”取代,社会生活例行化走向终结,个体行为的决策受到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个体的本体性安全和信任的根基被抽离。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的日常生活被远距离关系的地域情境完全改变,我们全都不由分说地被卷进一场宏大的实验,从而生活在一个充满错位和不确定的世界之中。如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所言,“一旦社会生活的基本传统悄悄地改变,我们便生活在一座其基础已被暗中破坏的建筑物之中,从传统秩序到暂时混乱的变迁,可以在没有先兆的情况下完成”^②。

就全球化的影响而言,全球化在现代性早晚两个阶段发展的程度是不同的,“本阶段的全球化不应与前一阶段的全球化相混淆,本阶段的全球化正在日益颠覆前一阶段全球化的结构”^③。全球化第一阶段的主导者主要是西方及源于西方制度的扩张,其他文明未能对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也未能在如此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在这一阶段中,区域化作为全球化的组成部分,正引导着一个社区或社会的成员在日常活动中遵循时空路径,反过来,日常时空路径又形塑了区域化方式。换句话说,这个阶段的区域化是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程度上进行的,其带来的社会制度还没有产生像当代社会那种颠覆性的巨变。但是今天的后传统社会与生俱来地一直在全球化,“全球化虽仍由西方势力主导,但它已不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双向的,应该说是无中心的,没有明显的方向,其发散性基本是永存的”^④。并且,“全球化倾向与日常生活中的地域化事件之间存在着内在关系:‘外在事物’和‘内在事物’之间存有一种复杂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220页。

② [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张旅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7页。

③ [德]乌尔里希·贝克、[英]安东尼·吉登斯、[英]斯科特·拉什:《自反性现代化》,赵文书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21页。

④ 同③,第131页。

而辩证的关联。”^①比如,异地遥远的事件可以与个人的日常生活直接挂钩,个人生活中亲密行为方面的变迁,个人在日常琐事上的一个决定能造成全球性的影响。个体情境化互动的“日常实践”与现代社会生活的大规模、甚至是全球的社会系统特性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距离,前者甚至可以作为后者结构特征再生产的中介。作为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结果,日常活动与全球性后果的关联实际上非常重要,同时,全球化系统的再生产或者变革暗含在完全多样化的日常决定和行动之中,这样一来,微观的日常活动与宏观的全球系统联系就在一起了。

就反思性(reflexivity)^②程度而言。随着后传统社会的到来,反思性的广度和深度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在政治领域中,社会反思性的深入推动致使知识与国家控制分离,国家不能再随意把自己的公民当作“臣民”来对待。同时,“对政治重构、消除腐败的要求以及对正统的政治机制的广泛不满在某些方面反映了已经增加的社会反思性”^③。就个人反思性而言,它不但囊括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而且延伸到自我的核心部位,包括身体亲密关系,甚至反思本身都沦为反思的对象。吉登斯把它归纳为一种生活手段、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甚至是一种社会制度。在抽象系统的权威已经动摇的情况下,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了我们命运观的转换,我们不再认可活动的所有方面都受制于先天的安排,而是觉得所有活动的发生都可能是偶然的。反思性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把中观层面的制度建设和微观层面的自我认同都纳入其活动范围,成为晚期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对于结构化理论来说,反思性体现在对行动者知识性的强调上,这是人们对自身行为具有清醒认识的表现。至于现代性的反思性,突出体现在人们的生活不是为过去所构造,而是为未来所构造。更具体地说,“是更被无法预见的未来所构造,人们被迫对此进行连续不断的反思”^④,意味着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决策和选择都是“朝向未来”的。行动者的反思性指的是行动者以半意识性的方式监控自身的所作所为,具有普遍的性质。现代性的反思性监控更是一种制度化的监控,具有历史色彩。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108页。

② 国内学者对 reflexivity 有三种的译法:反思性、自反性和反身性。自反性与反身性更大程度上属于社会学概念,而反思性从启蒙理性的角度而言偏向于哲学概念,鉴于本文涉及生活政治的哲学含义,所以笔者选择反思性的译法。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第7页。

④ 郭忠华:《现代性理论脉络中的社会与政治:吉登斯思想地形图》,第94—95页。

如果对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来说,“现代性的危机”^①是根本尚未澄清而且变得越来越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那么对吉登斯来说,在诊断现代性本身特征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生活”才是当务之急。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晚期现代性阶段的政治诉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吉登斯认为晚期现代性最大的变化在于,“在西方国家,不仅公共制度而且日常生活都在脱离传统的掌控,而世界上其他一些仍然维持传统的社会也正变得非传统化(detraditionalised)”^②。柏克(Peter Burke)在《自由与传统》中指出,传统包括道德风尚、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三方面内容。吉登斯在强调传统第一层含义的基础上,认为从道德层面来看,传统的终结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首先,传统同于习俗,但有别于风俗,传统并不仅仅是一种很特殊的时间性体验,它还体现出“既往之事”对日常生活连续过程中所享有的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辖制。传统不仅仅是惯例,它自身内在地充满了意义,不是为习惯而习惯的空壳。它暗示着一种“礼仪性真理”(ritual truth)观念,具有集体性,它属于集体记忆,是群体、社区或者集体所具有的特征,是社会的规范或者说是道德意涵得以渗入日常生活可逆时间(reversible time)的基础。传统的行为有其自身的道德禀赋,体现了道德的可能性,如学者凯克斯(John Kekes)所总结的那样,“没有传统,个人将陷入迷失中,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生活,这曾经是由传统提供给他们。个人从传统中获得各种可能的生活,善的生活主要依赖于传统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③。换言之,传统为个人的行为提供善的可能性。

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道德本质与过去和现在的阐述过程密切相关,从根本上来说,传统是内嵌的,起着维系日常惯例的规范作用,为解决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提供保证。人作为政治动物,时时处于必须做出“选择”与“决断”的境况之中。在任何特定的时刻,面对日常生活中的任何事态,个体和集体都会遭遇到无限的潜在行动过程(以及与之相伴随)的风险,我们都必须做出“决断”。那么,判断的依据又何在?在现代性早期阶段,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为不受质疑的行为提供了框架(framework)。现今,我们的生活中缺乏普遍性伦理原则(如正义、自由、权利、人格尊严上

① 对施特劳斯来说,现代性的危机是最重大的时代问题,因为西方现代性究竟把文明引到何处去还是个未知数。

② [英]安东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红云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③ John Kekes: *A Case for Conservat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41.

的平等),当自身的行为缺乏外来普遍性的规范,我们该怎么办?

对人类整体而言,传统,特指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的实质性传统(substantive tradition),具有强大的道德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以及深深渗透着传统的制度,并且希望把世传的范型看作是有效的指导。”^①它以权威的形式使个体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带有约束性特征,使集体和个人的价值观保持相对一致,为个人的善行为提供本源,确保个人与社会共同体和谐发展。传统为社会共同体提供有效的、可行的、规范的行为模式,维护着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随着传统的消弭和个人主义的抬头,“以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导致共同价值和公共关怀的瓦解,伦理和关于生存的问题被排挤到当代政治讨论之外。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以它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为支柱,如果它们随着传统的消失而被颠覆,那么新阶段的行为规范又从何而来?

传统作为一种秩序,在其概念中含有某种规范的要素。行为规范强调的是它的普遍性,虽然爱德华·希尔斯认为传统总是在变化中,然而传统的概念中有某种东西包含着耐久性,传统的信念或习俗具有抵制变化的完整性和延续性,为我们提供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②,为在身份的延续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信任”提供了一块停泊地。传统是长期被默认而固定了的社会格式和生活方式,它所规定的生活未必有多好,但它总是一种稳定秩序,已经尽量减少和降低了生活中的不可测因素和破坏性风险。“保守主义者希望能够维护传统,道理在此。”^③没有稳定的秩序,规范又从何而来?在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Christopher Pierson)的谈话中,吉登斯承认不能一味地谈社会变革,还要重视社会的稳定。社会发展在连续与非连续、断裂与非断裂中寻求的不只是平衡,而是一种相当于制度的规范。

此外,体现为政治体制和宗教信仰形式的传统保证了法律的来源。任何政治社会的存在都离不开该社会的“意见”,即该社会的主流道德和宗教信念,以及以这种主流道德和宗教为基础制定的法律;“如果这些‘意见’被‘哲学’颠覆,也就可能导致该社会的瓦解”^④。传统本身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它对政治共同体的社会一体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霍耐特(Axel Hon-

① [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2页。

② 指时间上的连续和有序的感受,这包括那些并非直接是在个体感知环境中的感受。

③ 赵汀阳:《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4页。

④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导言第62页。